

理論移植或創新：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發展
(1998~2008)*

**Copying or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1998~2008)**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 余佳芳**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張登及***

Yu, Chia-Fang

(Master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ng, Te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本文係國科會「中國國際關係／學爭論：知識社群的國家認同分析(1996~2008)」計畫(NSC97-2410-H-194-059)執行成果之一部。作者們謹此向國科會的支持表示感謝。

** 作者電子郵件地址：nanaloveu99@gmail.com

*** 作者電子郵件地址：tchang@ntu.edu.tw

Copying or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1998~2008)

Yu, Chia-Fang

Master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ng, Te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mainstream theories of the West. Especial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neorealism, rising powers in the system are expected to challenge the incumbent hegemon and hence try to rewrite the established order.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contrast to neorealism, literature of neoliberalism stresses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learning and copying of the imported Western theories above, Chinese IR scholars manage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rise of China highlight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established order, with the insights of neoliberalism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aims at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IR scholarship in neoliberalism. It further compare the main promise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hinese studies of it to find out whether Western neoliberalism will be innovated through Chinese scholars' imi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inally, by bringing together Chinese scholars' neoliberalist studies, it offers a prospec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R studies, including the rise of "Chinese School".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oliberalism, Epistemic Communities, Chinese School

理論移植或創新：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國際 關係學界的發展（1998～2008）

余佳芳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

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主要是由西方的知識社群所形塑。對於崛起中的大國，其論述大都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視角分析，認為國家會根據權力多寡與處於國際體系的位置，調整對外政策。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國家，自然亦不例外。

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對於冷戰後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相互依賴與國際組織參與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這也鼓舞中國內部不少學者，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角度，思考與闡述中國的崛起。本文的研究即以90年代末以來中國國關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做為主要分析重點，從中找出論述的主要類型與對中國國關學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核心人物，探討由西方發展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經過中國知識社群「臨摹」與「改造」，是否會產生理論移植或創新的現象，並探討其論點發展趨向。而本文結論認為，中國國關學界經由引介西方自由主義國關理論，確實帶來豐富的理論反思與創新動機。但其知識社群的理論進步毋寧說還處在「初級階段」，其未來動向值得台灣同行密切觀察。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新自由主義、知識社群、中國外交

壹、前言

當代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是由西方知識社群所形塑的，特別是美國的國際關係知識社群，影響力尤大。對於崛起中大國的對外政策，西方主流論述頗多以結構現實主義的假定作為分析主軸。¹但是，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瓦解，國家間衝突不再侷限於美、蘇兩大陣營間，交通與通信網絡的便利與快速，不只加強國家間或國家與非政府行為者的往來交流，也相對增加彼此關係的複雜性與依賴性。有鑑於此，許多國際關係研究者也開始以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觀點，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的實質意涵。²

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對於冷戰後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相互依賴與國際組織的參與皆提供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雖然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秉持相同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利益是國家間互動主要考量。³不過本文認為，西方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理論承襲古典與現代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脈絡，因此也深受自由主義哲學思想影響，分享相似的世界觀。再者，新自由主義對於異質文明國家的發展，雖然基於理性主義與經驗現實的分析，暗示

-
1. 典型的論述可以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為代表。例見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542。
 2. 本文認為，這一發展帶有典範變遷的意味。雖然在社會科學中，理論要有「典範」的地位並不容易。依循孔恩（Thomas S. Kuhn）與拉卡圖斯（Imre Lakatos）科學哲學研究觀點，當舊典範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研究者可能就會發現典範正在發生變遷。綜合參閱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2002），頁47、165~169；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16~117;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00.
 3. 例見陳欣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30。

了「民主和平」的預期，卻經常出現兩種不同論點的悖論。其一認為全球於相互依賴的關係下，不同國家的行為不僅將趨於相同，同時也會促進國家社會內部的多元化和啟動國家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的看法，卻是對異質文明的未來共存頗為悲觀。⁴

如果冷戰後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辯證具有某種典範競爭的色彩，則無論後來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虛實如何，中國知識社群的介入，應該對兩大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由於近年來中國學界大量引介西方各種社科學理，並企圖發展具有自主性的新學派。除此以外，當中不乏有學者藉由提出西方理論中是否存在「客觀歷史的進程」的問題，一方面反思普遍認同的國際現象是促進全球的整合的趨向，亦或是少數國家依其意志促成；另一方面則藉由檢討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以發展中國本土的國際關係理論。⁵在這樣情況之下，除了較易與馬列毛傳統相銜接的現實主義外，西方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引進，究竟會造成什麼知識上的效果，是理論與實務界都應該關注的問題。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聚焦討論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發展新自由主義理論具有重大影響的幾位核心人物，以深入剖析其主題概況與論述，並以類型化的方式，整理出其主要訴求。同時，本文也將藉由檢視西方發展出來的新自由主義，在經過中國知識社群（這裡是指其國關學界積極關注自由主義理論的論者）的「臨摹」與「改造」之後，探討是否會產生理論移植或創新的現象。⁶在研究途徑方面，

-
4. 例見參閱張登及，「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的中共外交研究：一個概觀」，*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11期（2001年11月），頁15~34。
 5. 綜合參閱王逸舟，「中國國際關係學的一種審視：對學科分支領域的快速掃描（中）」，*教學與研究*，第10期（2006年），頁31~38；王逸舟，「新視野下的國家利益觀（代序）」，王逸舟分卷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頁11。
 6. 相關著作請參閱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Introduction: geocultural epistemologies,"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1.

本文主要結合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的理想類型（ideal-type）概念，與當代的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分析，作為梳理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論述的方法。以下簡要敘述之。

貳、核心概念：理想類型與知識社群

一、理想類型與國際關係理論

學者史密斯（Steve Smith）主張，國際關係理論的事業，是指理論家描繪真實世界（real world），並將之付諸「實踐」（據以分析「真實」並產生判斷）。⁷因此，問題在於到底真實世界該由誰來描述？主要論述的內容為何？如何成為具體的理論？隨著論述者的不同如何導致了理論的扭曲或創新？這些都是理論的核心問題，涉及到知識論甚至本體論。

韋伯的理念型方法不僅是一套社會學的分析架構，還帶有濃厚的知識論意涵，可以為史密斯的問題解惑。根據韋伯的觀點，純粹連串的歷史事件是無法形成理論的。要獲取實在的理論知識，須找出文化事件的因果關係，從中萃取出內涵的意義與價值，也就是側重於某一面的強調，透過具體問題之經驗分析後，才被創造、修正的理想類型（ideal-type）。⁸而國際關係理論的印象分類（ima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利研究者以側重某一理論所強調的觀點，從中檢驗理論對真實世界的解釋力，或者在當中察覺理論的異例。換言之，這並不意味不同理論的不相融，而是知識論上，對不同面向「真實」，解釋力的強弱而已。⁹

7.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8.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9), pp. 49~112.

9. 韋伯認為，實在本身具有無限多方面的聯繫，這種無限多的連繫，對於任何無前提的認識者來說都是一個混沌的世界。所以他明確地表達，理想類型事實上是

二、知識社群理論概念與檢索操作

本研究探討之新自由主義論述，強調知識社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¹⁰例如艾德勒（Emmanuel Adler）與哈斯（Peter M. Haas）認為，國際間出現合作的主要原因是來自科技的發展、國際間不確定因素的增長、相互依賴等種種因素，當中知識社群即扮演撤除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虛假藩籬的角色。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國家間處於動態互動賽局，知識社群也在國際賽局中，發揮資訊溝通與初始的政策論述功能。¹¹

魯杰（John Gerard Ruggie）也認為，科技發展衍生出各種問題，加深了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這種情況稱為集體情勢（collective situation）。他並針對集體情勢與集體反應的發展，設計分析方法。集體情勢如何在四個不同的向度中達成制度化的集體反映（collective response），主要關鍵之一就是知識社群，藉由知識社群間分享共同的符號、認知與專業知識交流，「真實社會」於是被建構出來。¹²

由此可知，知識社群可扮演共識凝結的角色，提供國際行為者

來比較和衡量實在的手段，並因此而成爲引導人們達到實在知識的指示，使人們借此進入對於歷史世界本身的因果解釋。Weber進一步強調，研究的結果往往是理想類型的偏離，如果達到這個結果它（ideal type）就完成它的邏輯目標，這恰是因爲理想類型自身的非實在性。所以Weber的理想類型具有相對性與暫時性的特點，決不代表唯一可能的觀點和見解。並強調理論是歷史認識的僕人，而不是相反。Max Weber, *ibid.*, pp. 49~112.

10. Emmanuel Adler 與 Peter M. Haas明白指出，利益的預期與價值是被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所創造。所以本文著重於定義國家利益的知識社群論述分析。參閱Diana Panke and Thomas Risse, "Libe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0~91; Emmanuel Adler and Peter M. Haas, "Conclus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Order,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flective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Winter 1992), pp. 367~390.

11. Emmanuel Adler and Peter M. Haas, *ibid.*, pp. 367~390.

12. 參閱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Summer 1975), pp. 557~583.

各種政策選項。不同知識社群間同時也有競逐。換言之，受知識社群發展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會隨著國際情勢不同，結合各種知識社群對理論的闡述。這可能是強化理論基本意涵，或是導致理論的創新。所以「知識社群」概念對本文而言具有雙重意涵，它是研究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各種理論發展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解釋國際合作的主要命題之一。但本文主要側重中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引介者們，作為一個知識社群，其論證的發展與變遷，暫不研究此一社群與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e-effect analysis）。

綜上所述，為有效解析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之新自由主義論述，本文首先將嘗試應用韋伯理想類型概念，把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論述予以類型化。其次，透過新自由主義理想類型分析模式以及知識社群分析方法，探討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在引入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後，是否於闡述理論內容之外，產生理論移植或創新的結果，也就是理論從移植複製，到創新改寫的過程。後者意味著拋棄或大幅調整原始類型的核心理論假定，雖然研究的結論仍與原始類型相近。¹³

至於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論述方面，本文首先先操作性地定義一個「中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知識社群」的範圍，以及成員確認的方法。中國學者蘇長和指出，1998年起中國國內對新自

13. 本文企圖借助拉卡圖斯核心理論的概念，此較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論述是以新的輔助理論為原型理論增添新的內涵；或者，其輔助理論以證實原型理論為退化理論的結果另創新理論；亦或是，其輔助理論並沒有對原型理論產生任何變化。為有效達到借助拉卡圖斯的觀點，檢視中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知識社群是否／如何調整了新自由主義的原始內核的目的，本文應用韋伯理想類型（亦稱「純粹類型」）概念，類型化中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並加以比較，以探討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在引入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後，並於闡釋理論內容的過程中，是否產生內核改寫的創新理論原素，產生某種「具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之新理論核心。綜合參閱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p. 132~137; 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

由主義相關研究數量增多，以中國核心期刊之一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為例，統計1998年迄2005年中期為止，該期刊刊登相關研究的文章就有89篇之多。¹⁴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於9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與新自由主義相關研究的主要原因與1997年其國內外形勢變化有相當大的關連。其中幾個重大的變遷事件包括：金融危機襲擊東南亞、香港回歸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北約東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¹⁵簡言之，中國深入參與國際事務，與外部世界出現如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相互依賴現象，導致中國面臨全新的國內外挑戰。綜合以上論述本文研究中國學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相關論述以1998年為起點，直至2008年。¹⁶並藉由中國核心期刊「世界經濟與政治」做為掌握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論述的文本母體，檢視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知識社群主要論述，初步探討新自由主義引入中國後會產生理論移植或創新的現象。¹⁷檢索資料步驟如「表一」，搜尋與新自由主義相關的關鍵詞檢索期刊，¹⁸以進一步提取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論述的代表性人物。

-
14. 中國學者秦亞青曾以量化中國核心期刊的方式，證明新自由主義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後，不僅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理論之一，且與其相關的研究數量也增多。綜合參閱蘇長和，「中國的國際制度理論研究」，頁114~115；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1期（2008年），頁13~23。
 15.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主編，*1998國際情勢年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114~115。
 16. 本文資料係來自國科會「中國國際關係／學爭論：知識社群的國家認同分析（1996~2008）」計畫，故檢索對象亦先僅截止於2008年。
 17. 由於學者對研究途徑的選擇可能會因各種因素有所變動，本文檢索標準下找出的代表人物並非始終一貫的新自由主義論者。因此，本文主要側重分析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中，持續關注與集中研究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的學者群體，並藉由分析這些學者從1998年至2008年發表的相關著作，嘗試梳理中國新自由主義對於從西方傳入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見解。同時從當中找出，新自由主義於中國知識社群的主要發展脈絡。
 18. 關鍵詞的輸入除了包括「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外，並使用本文將西方新自由主義分為五大類型做為檢索資料的關鍵詞。由於檢索方式不同，最後的檢索成果會與其它同樣以「世界經濟與政治」做為研究範本而做出的結果有所差異。

表一：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研究知識社群檢索步驟表

步驟一	輸入與新自由主義相關的關鍵字檢索期刊。 ¹⁹
步驟二	找出發表關鍵字檢索結果之文章的作者。
步驟三	藉由輸入作者姓名搜尋其發表次數，排除僅發表一次作者。
步驟四	經步驟一、二、三重覆交叉檢驗找出具代表性人物及其文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依照檢索結果，1998至2008年期間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於「世界經濟與政治」發表與新自由主義相關論文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別為王逸舟、田野、門洪華、時殷弘、秦亞青、蘇長和等人。至於其論述的分析，將在第四節闡述之。

參、類型化西方新自由主義論述

本文接續依照新自由主義的分析單位、體系結構、國際關係互動過程、價值關懷四大面向，先概述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共同基礎。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依序討論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合作、權力與相互依賴、國際制度、民主和平論五個新自由主義理論子類型。它們在共同的核心基礎上，分別又有不同的側重。

一、類型的理論基礎：理念主義與物質主義

自由主義的思想淵源與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了不同流派的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²⁰有論者把它們區分為：起源於格老秀斯(Hugo

19. 依據下一節的新自由主義原始類型主要內容分類，檢索關鍵詞分為四類型，包括：類型一的「合作」、「秩序」；類型二的「相互依賴」；類型三的「成本」、「尋租」、「多邊」、「理性」；類型四的「民主和平」。

20. 關於新自由制度主義是否囊括在新自由主義之中（又或，新自由主義等同於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個名詞可以相互使用），或者是否能獨立為一個國際關係理論，至今仍未有定論。不過依據奈伊對新自由主義的定義，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群包涵以下三點理論概念的學者：(1)主張民主和平論者(2)主張商業自由貿易和平論者(3)主張理性降低全球無政府狀態特性，並產生制度與國際秩序論者。本文擬將新自由制度歸類於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流派。綜合參閱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uary 1998), pp. 235~251;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Grotius) *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的自由制度主義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或稱為理想主義 (idealism)、經濟自由主義 (economic liberalism) 或稱為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t)、批判自由主義 (critique of liberalism)。²¹ 又有人將自由主義分類為共和自由主義 (republican liberalism)、相互依賴自由主義 (interdependence liberalism) 當中又分為商業自由主義 (commercial liberalism) 與軍事自由主義 (military liberalism)、認知自由主義 (cognitive liberalism)、社會自由主義 (sociological liberalism) 與制度自由主義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六種。²² 不同流派的自由主義並不代表理論間不可調和的分歧；相反地，這些派別均屬於自由主義的主要分支。所以類型化西方自由主義論述的首要步驟，須先探討新自由主義多重理論論述當中，核心的理論基礎。綜觀新自由主義思想淵源與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不同派別因側重研究面向的不同，會有不同基礎論據，²³ 單一理論論述不足囊括新自由主義全部內涵。然而，

Harper Collins, 1993), pp. 36~40.

21.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tario: Thomson Learning, 2004), pp.124~132.
22.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21~122.
23. 潘克 (Diana Panke) 與利斯 (Thomas Risse) 在 "Liberalism" 一文中，以追溯起源自康德的 "second image" approaches，發揚光大於1970年代的國內因素研究，探討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並依據自由主義側重為者中心理論 (actor-centered liberal theories) 或結構中心 (structure-centered theories) 理論的差異，把自由主義分為四種研究象度：

	理性主義／行動	建構主義／互動
行為者中心	行為者中心理性論者自由主義	行為者中心建構論者自由主義
結構中心	理性論者民主和平論和相互依賴理論	建構論者民主和平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種分類有相同的核心理論，那就是，於國際層次解釋國家的行為的同時，不能忽略國內層次相關變數影響力。所以，此種分類僅代表自由主義多重的研究方法。參閱 Diana Panke and Thomas Risse, "Liberalism," pp. 91~98.

在多種論述中可發現，新自由主義理論分支時常游移於兩端：傾向物質主義者會主張體系層次結構性力量主宰國家行為產出，決定國際互動關係；傾向理念主義者會強調國內層次行為者如何在不同歷史背景、文化價值觀，對來自國際化的壓力做出反應。

傳統自由主義採取個人主義、由內而外（inside-out）的方式辨識利益，視國內行為者理念因素實踐下所形成的制度，為解釋國際關係的重要變數，也就是獨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例如古典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曾指出：

通過研究個人活動的綜合影響，才使我們發現，人類賴以取得成就的偉大規章，已經在沒有計劃與主要思想下產生，並正在發揮影響力。²⁴

而相異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與國內因素說明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以古勒維奇（Peter A. Gourevitch）的反饋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為研究路徑，討論國內政治研究的國際政治根源，及複雜相互依賴理論概念下，國內的行為者的理念與社會制度如何面對來自國際化的壓力。²⁵雖然新自由主義的研究途徑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但是從以上針對新自由主義研究方法的討論中，可明顯發現，新自由主義仍包含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性個人主義假定。

24.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6~7.

25. 綜合參閱Peter A. Gourevitc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p. 328;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 883; Helen V. Milner and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Helen V. Milner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24.

再者，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的國際關係制度研究，雖然借鏡了結構現實主義觀點，強調國際合作主要依賴國家由互利所建立的制度規範，²⁶但他同時指出，國際關係研究者不能忽略「內外互動」之間的關聯。²⁷基歐漢與奈伊（Joseph S. Nye）合編的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也主張以國家中心分析方法審視世界政治是不夠充份，並提出跨國交往互動頻繁下，造成行為者觀念相互流動，衝擊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典範。²⁸完全偏向新現實主義基本理性假設，忽略影響個人偏好的變數（例如：人們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如何去解決問題、追求自己的目標），無法完全解釋國際制度的特徵。²⁹易言之，管理國際事務的政治官僚、媒體與促進國內外價值溝通的知識社群，都扮演溝通行為者（linkage agents）的角色，連接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³⁰可以說，基歐漢和奈伊的理論分析方法本身就游移於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之間。³¹

二、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合作

雖然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部份相同的假設，認為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兩者的差別在於，新現實主義者對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被制約感受較深，認為國家之間利益衝突，使得國際關係呈現緊繃僵固的狀態，因此無法像新自由主義者一樣，樂觀期

26.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2~3.

27.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0~197.

28.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ix~xii.

29.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30. Helen V. Milner and Robert O. Keohane, *ibid.*, pp. 3~24.

31. 參閱Diana Panke and Thomas Risse, "Liberalism," pp. 91~98.

待國際建制的效力。相比之下，新自由主義者較偏重全球在經濟、環保、政治等議題上的合作。對於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新新綜合」，³²新自由主義者指出，新現實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但試圖超越新現實主義，以增加解釋國際體制變遷的能力，³³並主張無政府狀態因為存在合作性的安排，所以不是持續性的混亂。新自由主義認為，正是因為國家是自由、自助和自利的，促使他們在面對共同利益與共同困境時，建立國際制度。³⁴例如，斯坦因（Arthur A. Stein）基於19世紀經濟學家倡導自由放任的概念，主張訊息開放情形下，驅使自利行為者在計算交易成本之後，能理性衡量合作的利益大於相互對抗交易成本。³⁵

又如布爾（Hedley Bull）也主張雖然無政府狀態無法消除，國家在國際體系的行為卻可以被限制。外交、國際法、權力平衡與同盟可維持秩序，並加強合作與推展國際道德標準。布爾指出只有均勢、國際法、外交、大國作用以及戰爭等才是國際社會有效的制度，一如懷特（Martin Wight）提出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假制度（pseudo-initiations）。布爾且認為，部分新自由主義學者過於強調國際組織對合作形成的重要性，導致學者未能將注意力集中於國際秩序存在更為根本的其他因素上。³⁶

32.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s,"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a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

33.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pp. 158~200.

34. Arthur 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Spring 1982), pp. 294~324.

35.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 7.

36.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p. vii~xii.

三、權力與相互依賴

1950年代哈斯（Ernst Haas）開始以「相互依賴」的概念研究歐洲共同體。十多年後，魯杰（John Gerard Ruggie）以集體情勢（collective situation）闡述相互依賴的概念。他認為，集體情勢產生的主要依據分別為：科學與技術越來越政治化、政治化議題中所展現政策相互依賴的種類、政策相互依賴的軌跡、國家政治考量中相互依賴所佔的比例等。³⁷繼魯杰之後，1968年奈伊與基歐漢以及一批西方學者加入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雜誌編輯委員會，主張公司、團體、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塑造複雜星形體的國際關係網絡，開啓國際「互賴」關係的研究。³⁸隨後1972年奈伊與基歐漢共同撰寫的*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明確指出相互依賴為權力之源，並強調在某些情勢下軍事手段決定一切，而在其他情況下，經濟的相互依賴下產生的權力比軍事力量更為有作用。基歐漢和奈伊據此進一步建立「複雜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論概念。³⁹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以複雜相互依賴作為理論基本假定，認為「連繫戰略」、「議題連結」與國際組織的角色，最終改變了政策形成過程。換言之，不同於偏向結構論的霸權穩定論主張；基歐漢與奈伊則提出，霸權穩定論忽視各個社會之間多渠道聯繫所造成複雜情況。這也代表當不存在重大安全問題的情況，使用武力的代價高於獲利，因為某些問題領域（issue-areas）所產生的政治結果，不能再簡單地用這些領域中的政治資源來解釋，在某些情況下因為情境的不同，許多議題的形成是由下而上的。⁴⁰

37. John Gerard Ruggie, *ibid.*, p. 560.

38. Joseph S. Nye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

39. Joseph S. Nye著，*硬權力與軟權力*，頁4；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Glenview: Harper Collins Press, 1989), pp. 24~29.

40.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42 ~ 57.

四、國際制度

1977年出版的*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關注國家建立國際制度的原因，將互賴視為國際制度運作的情境，開啓了國際制度的研究。⁴¹解釋國際制度的建立、持續與發展的研究假設有許多種類，一般分為權力基礎假設（Power-Based Hypotheses）、利益基礎假設（Interest-Based Hypotheses）、知識基礎假設（Knowledge-Based Hypotheses）三種。⁴²此處採用哈斯（Peter M. Haas）的論點，認為權力基礎假設無法說明制度的發展過程，因此將制度的研究之假設分為利益基礎與知識基礎兩大類。⁴³

（一）利益基礎下－理性選擇理論

1984年基歐漢的*After Hegemony*在理性主義的理論基礎下，進一步解釋制度形成的原因，當中運用個體經濟學博弈理論與公共財理論解釋，即使國際上缺少最高權威，在國家是理性自利的概念之下，合作仍是存在的，但這種合作的存在，必須依靠國際制度或國際建制。⁴⁴他認為，理性選擇並不是用來全面理解國際制度改變主要原因，而是探測制度的趨勢走向。

（二）知識與觀念基礎下－知識社群與觀念的作用

新自由主義除了假設，在多重賽局中，理性行為者會在合作利益大於對抗之模式下，形成制度外，同時亦著重分析以下兩個與國際制度研究相關的議題：首先，制度形成之前，不同的行為者會如

41. 亦參閱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4.

42. 參閱Oran R. Young and Gail Osherenko, "Testing Theories of Regime Form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228~237.

43.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68~169.

4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5~84.

何「理性」思考，且精密計算成本與獲利，最後建立形成制度前的合作共識；其次是制度如何變遷、演化最後達到理論趨於完備的過程。

關於第一個問題，鮑威爾（Robert Powell）曾指出，合作共識達成的主要原因是，行為者會預期其所做出的決策對未來將造成何種影響（the shadow of the future）。例如，國際政治重複互動模式，即說明一國即使有不合作的行為發生，也會預估不合作行為對未來之影響力再決定是否合作。當對未來的影響夠大時，也就是不合作行為造成的代價超過獲利時，即使是不合作的國家行為者，估算代價與獲利後，也會採取合作的態度。⁴⁵然而對於應該如何預期國際政治未來趨勢的問題，伊肯伯理（G. John Ikenberry）與庫普查（Charles Kupchan）以為，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學習過程（process of learning）中，不同的知識社群經由互相交流、學習以建立共識，而經由知識社群所建立的共同理念（idea），日後將成為行為者預期未來情勢的重要依據，與做出理性（rationally）行動的思維架構。⁴⁶艾德勒（Emmanuel Adler）與哈斯也提出，隨著國際間逐漸強調科技、複雜與不確定相互依賴，知識社群融合不同的思想，將改變基本的國際實踐模式。⁴⁷

關於第二個議題，1993年戈爾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歐漢主編的*Idea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以強調觀念（ideas）因素在世界治政具有重要的作用力，說明國際政治變遷的過程中除了需要考量物質性的因素外，觀念透過

45.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Issue 4 (December 1991), pp. 1303~1320.

46.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Summer 1990), pp. 283~315.

47. Emmanuel Adler and Peter M. Haas, *ibid*, p. 373.

以下三種因果途徑，發揮重要的影響：⁴⁸第一，提供原則性或一般性的路徑圖（by providing principled or causal road maps）；第二，在沒有精確的策略情況下，作為影響策略的因素（by affecting strategies where is no unique equilibrium）；第三，作為制度內嵌的因素。其中戈爾茨坦與基歐漢特別闡釋若觀念因素被嵌入規格則和原則之中，形成制度且根植於制度，其對未來的政策發展也將發揮重大的影響，且無論原始觀念形成政策的原因是源自於個別國家或領導人所秉持的信念，新觀念的出現能否影響既有的制度仍取決於，現行制度根本存在的觀念條件因素是否發生根本的變化。雖然戈爾茨坦與基歐漢僅從觀念影響政策的層面說明觀念的重要性，沒有清楚指出觀念因素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連，但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了解到，制度主義強調互惠與需求的物質主義是制度存在的條件，然而觀念作為制度內嵌因素，同樣地有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民主和平論

如果說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倡議的「十四點原則」是實踐康德（Immaule Kant）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政治思想的政策藍圖，⁴⁹那麼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相關論述所展現的，即是結合康德「永久和平」與威爾遜理想主義而發展出的民主和平論（Liberal Pacifism）。民主和平論是保存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規範性價值最為完整、豐富的一支。以下僅用羅塞特（Bruce Russett）與雷克（David A. Lake）的論點作為代表介紹之。

48.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p. 7~8.

49. 「十四點原則」全文參閱Marc A. Genest, *ibid*, pp. 138~141.

羅塞特從結構／機制限制模式（structural/institution constraint model）和文化／規範理論模式（the cultural/normative model）提出「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論。羅塞特說明同屬於民主國家交往中，如果出現衝突，因為國家認知到彼此間因為國內結構／機制限制不易發動戰爭，故能降低戰爭發生的機率。他也指出由於民主國家的文化／規範因素，也可使民主國家間傾向以妥協容忍化解衝突。⁵⁰不同於羅塞特側重結構與文化模式闡述民主和平，美國學者雷克以務實態度，採取與國際制度相同的研究方法，利用個體經濟學的觀點解釋民主的力量。他假設國家尋租行為使其在外交政策上創造了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民主國家中是屬少數的，因為在民主國家社會控制政府的成本是較低。相反地，要控制獨裁政府，社會所要付出的成本較高。這個傾向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將會是擴張主義，而且較好戰。國家之間缺乏專制主義傾向的時候，民主和平的現象就會出現。除此以外，民主體制國家的民眾會制止政府尋租行為，使得國家對安全問題會尋求戰爭以外的解決方法，民主政府也因為得到社會對它政策的支持，與民主國家結盟對抗專制政權。另一方面，因為民主國家的經濟較不會有扭曲的情況，且享有人民對它政策的支持，容易形成龐大的反專制聯盟，因此民主國家容易贏得戰爭。⁵¹

六、類型特徵的綜合

歸納上述論點，首先，西方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存在無政府的現實與特性，但並非是混亂無秩序的。國家身為國際體系中主要的成員，會重視國際合作並建立國際社會有效之制度。其次，

50. Bruce M.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8-40.

51. David A.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ch 1992), pp. 24-37.

新自由主義亦相信權力追逐為國家的主要需求與目標，但在複雜相互依賴的關係下，可促使國家合作。再者，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制度或建制是可以改變國家的行為與利益的，國家在國際組織的行為主要是受這些基本制度與規範的影響，而不完全是權力結構運作的結果。最後，新自由主義相信，理性行動者會以雙贏或非零合觀點為合作的優先考量因素；同時，藉由知識社群之間相互利益的交換或分享，與集體行動交流產生的共同理念，可進一步預期國際政治的合作趨勢。除此以外，新自由主義理論內容不僅依照現有的主要理論說明，國家在衝突與合作間如何互動、塑造和諧國際關係理論，更繼承了西方傳統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世界觀。例如，基督宗教文明、自利的個體可以推演延伸到全球的民主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發展過程與西方頗異的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引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時，是否會產生類似論斷？扮演溝通連結國內外政治的中國國際關係知識社群應用自由主義理論時，與西方知識社群呼應的程度如何？或者，由於中西方有不同的世界觀，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會以創新或改寫理論的方式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局部吸收新自由主義）？下兩節將從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研究代表性學者的論述當中，探究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應用，並根據本節的原始類型，考察中國學界引介新自由主義後的「改寫」情況。

肆、主題概況

回顧1998年至2008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主題，大致可分成三種分析取向。分別為中國學界對西方理論引入與探討、反思理論研究成果，以及中國本土學派生成之可能性。

90年代末期，大陸著名國際制度研究者蘇長和提出理論對國際關係重要性的幾點論據。他認為，理論研究希望接受的研究綱領和

科學哲學，是能最大程度達到「最終理論」，即對現實生活所發生的事實客觀的抽象化描述。藉由理論，研究者以較為客觀的態度，觀察刻劃現實，以此建構反映事實的理論，以描述客觀現象，且有助於政策決策者做出適當決策。換言之，理論可做為政策實踐的主要指導方針。除此之外，理論研究另一種意義為，它是特定學科在知識系統中的合法性和獨特性提供論證，為其地位立身正名。⁵²

同時，資深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王逸舟很早就呼籲，中國學界需要強化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並自我反省。他主張理論研究應注意以下幾點：⁵³

1. 中國學界現階段缺乏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全面性與長期性的研究。
2. 需重視全球化相關研究，且不可簡單地在全球化過程中與歐美一些強國「完全趨同」。換言之，研究者需認知，中國學界如何創造性的進入全球化研究領域範圍，於當中找出全球化的「真理顆粒」。
3. 後冷戰時期，國際制度、規範與國際組織對國家的影響增強。研究者不能忽視：是誰制訂制度、規範與合作方式、當中是否包含著特定歷史階段上國際力量格局的舊的特徵、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符合與適應時代的變化，以上相關問題。

歸結以上論述，中國學者除了強調理論重要性、深化全面和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外，也提醒研究者要提出研究問題時需注意的面向，那即是——誰的理論，以及理論的後果如何。在此方面，這些學者帶有國際關係理論「批判學派」（Critical Theory）的色彩，只是其出發點未必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而是中國對西方事物的疑懼。

52. 蘇長和、彭召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貧困：對近20年國際關係學在中國發展的反思」，*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1999年），頁15~19。

53. 王逸舟，「面向新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若干思考與建議」，*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1999年），頁4~10。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新自由主義研究的評介者們不僅擔負引介的任務，也積極對引介理論提出反思。反思的主題包括主流理論本身的缺失，以及中國學界的成果與不足。

例如王逸舟指出，相較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新自由主義相關研究處於空白時期，90年代後期段中國學界（例如蘇長和、門洪華及其他一些作者）對理論得失做了初步探索，同時潛移默化影響政策的實施。另一方面還有幾點理論缺失須注意與強化。首先，中國的理論研究尚未能夠站在本國利益角度，探討中國如何在國際上作為負責任、和平崛起的大國；另一個是，缺乏融合跨學科領域研究，與之間的相互啟發不夠，例如哲學的深邃、經濟學的嚴謹、歷史學的淵博都值得學界學習；再者，學術批判的不足，學術批判有助於避免不符合學術標準研究重複出現，與形成自己學派、自己特色理論的出現；最後，理論研究太過於依賴美國，忽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研究成果。⁵⁴

易言之，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評介者們，除了對本國研究國關理論成果與缺失做詳細論述，也強調研究者需以開放的心態研究理論，並開始思索如何將中國的文化、歷史、哲學等跨領域學科與國際關係理論結合的問題。也就是說，學界對理論研析不再侷限於西方理論研究主要元素，當中包含中國文化、哲學、歷史等跨領域研究。

中國新自由主義研究者們同時進一步質問，中國的理論研究能否／應否本土化。論者對於這個大問題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強調整合與補足中國國內國際關係研究缺失的重要性和優先性；一種強調具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研究的必要。

例如蘇長和認為，研究者專注於中國是否能有中國學派，或者

54. 王逸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對成就與缺失的幾點感受」，*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3年），頁10~12。

是否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之理論研究，實際上反映出，中國沒有理論卻又渴求理論的急躁性。他認為，研究者首要的工作不是在這個研究問題上爭論，而是在於致力解決這門學科存在，諸如：研究人員科學訓練、研究隊伍的培養、擴大學術的規範、學術的國際交流以及國外理論的跟進。⁵⁵王逸舟同樣也指出，現階段中國學界政治化市場化的課題和任務太多，導致於理論充滿匠氣和功利色彩的東西。因為上述因素，研究者無法專注研究形而上學的問題、進行哲學上的批評，與缺少哲學做為「智慧之學」的前提下，無法建立創造新理論的環境。也就是，中國的理論研究缺乏主體意識。這種情形之下，王逸舟特別強調，中國離理論的創新還有一段距離，當務之急是要克服以上種種問題與缺點，以求中國理論研究的主體性在世界影響力的提高。⁵⁶

針對是否有中國學派的問題，引介不少新自由主義研究的青壯學者秦亞青基於主張建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必要性，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因為社會科學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徵，中國學派的產生是可能的。第二，中國深厚的思想背景足以形成學派（例如，天下觀、朝貢體系的實踐、改革開放的思想與實踐）。第三、中國學派產生不僅可能，而為了時代所需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正在崛起，未來不可避免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根本性辯論和實踐，導致中國學派的生成。秦亞青進一步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無論理解還是詮釋都加入了人的主觀能動，而非單純地發現和解釋客觀現象之間的線性因果關係。也就是說，由於地緣文化因素鑲入社會科學研究，不同文化行動者會建構不同的知識。但是這種論述並非是要創新理論取代先前的理論，而是對事實的推導。國際關係

55. 蘇長和、彭召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貧困：對近20年國際關係學在中國發展的反思」，頁15~19。

56. 王逸舟，「過渡中的中國國際關係學」，*世界經濟與政治*，第6期（2004年），頁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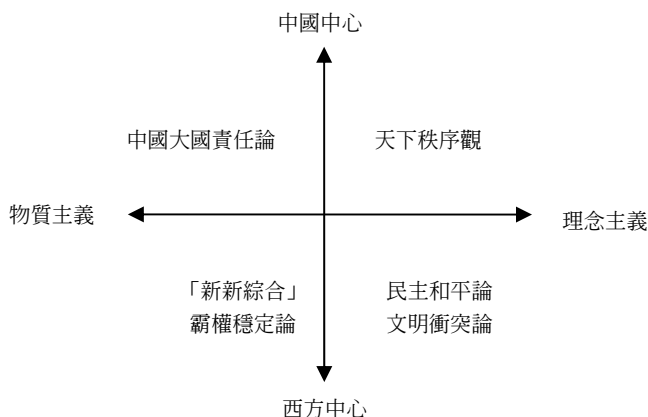
理論的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同時，需要效法先進社會的已有理論，用以解釋本土現象的理論，以達到中國學派欲達到「他已融合，普及天下」的目標。⁵⁷秦亞青除了應用地域性文化、思想概念與歷史演變說明「中國學派形成的可能與必然性」，也另從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統計研究中論證，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和現實經驗具有足夠的條件發展創新的理論。⁵⁸

綜合上述，可看出中國新自由主義代表性研究者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視野與所秉持的理論基礎，其內涵可利用兩個面向加以評估：第一、「中國－西方」分立的形而上的世界觀。第二、物質主義和理念主義的理論分析層次。前者表現出的是，他們對國際社會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論點認同程度（例如，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對西方國際制度理論的認同程度）；後者表現出來的是，中西方新自由主義研究理論對物質／理念因素的不同偏重。

如同前文所探討，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層次分析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偏向強調物質因素的「新新綜合」分析；第二，偏向重視行為者觀念的「弱式建構主義」分析。本研究認為，中國代表性學者的研究趨向也游移於結構現實主義與弱式建構主義的本體基礎之間。若同時以「中國－西方」的世界觀區分中國代表學者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視野，與以理念主義和物質主義兩種理論層次分析，可得到四種中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趨向：中國價值為本的理論研究、中國提供公共財成為東亞區域整合中心的研究、西方新自由主義與現實結構主義融合成的「新新綜合」理論與霸權穩定論研究、強調西方文明價值的理論研究—包括民主和平論與文明衝突論之批判。（參照圖一）

57. 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6年），頁7~13。

58.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頁13~2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一：中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者理論基礎分向圖

按照以上劃分的四種可能研究趨向，進一步將代表性學者的國際關係理論討論內容做歸類，可以發現雖然這個社群的研究，較多應歸入中國中心一端，他們擔心在西方語境中創建理論，對中國語境的運用可能產生陷阱。但他們也認為，借鏡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社會思想，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社群向前發展的原動力之一。無論中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研究社群的核心論點附和或不認同西方原始類型，卻都反映出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對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可以先提出四種中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者可能的研究向度，但若要探討中國國際關係知識社群是否具備主體性、⁵⁹進而界定代表性學者的研究向度與理論移植或創新問題，仍需比較中國新自由主義研究社群論述與原型類型理論的異同處。

59. 王逸舟曾指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由於缺少對中國的價值、思想和學問根基等問題的討論，因此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比較缺乏主體意識」。王逸舟，「緒論」，王逸舟主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學，2006），頁47。

伍、論述分析

一、國際合作的原因與方法

在國際合作原因分析方面，大陸學者田野以交易成本與利益的觀點出發認為，由於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政治缺乏最高權威的政府解決交易成本的問題，導致無法解釋國際政治合作的存在。新自由主義則確實為這一個現象提供具有解釋力的說法，並且在其它領域造成極大的影響力。田野進一步呼籲，中國學界應該重視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了解國際合作的主要原因，並在這一個基礎上為中國取得最大利益。⁶⁰

除了田野在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說明國際合作的原因，蘇長和也從新現實主義的不合時宜性，說明國家之間雖然仍存在爭端與摩擦，但隨著解決爭端與摩擦問題的制度性力量提高和國際組織化的進程，塑造了不同於幾百年前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因此相較於現實主義「大國衝突不可避免論」的非現實性，新自由主義可以從全球化的國際政治視角，重新理解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⁶¹他以安全困境為例，指出國際軍事上合作具有幾點重要性。其中包含：通過合作取得國家安全模式中（例如安全、裁軍、軍備控制、多邊協調），展現出合作正合性；以及國際議題的複雜化，傳統的安全觀不符合現實需求，並認為以均勢集體安全或世界政府模式下的安全架構都存在缺失。他進一步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安全框架，其主要意義包涵：第一，安全機制是開放性、非聯盟，與任何安全機制不能以假想的對手為其存在基礎；第二安全機制與其它機制（例如，貿易、金融、外交協調等機制）相輔相成；第三安全

60. 田野，「交易費用解讀國家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維度」，*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02年），頁22~27。

61. 蘇長和，「即將到來的大國衝突？《大國政治的悲劇》及其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3年），頁73~76；蘇長和，「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啓示」，*世界經濟與政治*，第7期（2004年），頁1~10。

機制的構造必須在主權國家的框架下進行。⁶²

田野與蘇長和為例的論述大略可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對於解釋合作的原因，大致仍以西方理論做為主要參考依據；第二，當今的國際情勢合作獲利會大於成本；第三，相較於西方自由主義有宗教信仰的道德規範因素，以及對於民主和平的自信，中國學界較側重以物質主義的「成本收益」解釋國際合作。

二、複雜相互依賴的解釋

田野使用公共選擇學派尋租理論，對複雜相互依賴論述做檢驗，分析國際政治中實力不平等權利主體間如何互動。他以國際上多為非霸權國向霸權國尋租為例，解釋非霸權國在權力不對等下使用尋租手段，便捷地達到目標。另一方面，由於國際組織影響力日漸加深，國際組織的「一會員一票」的決議過程，也使得霸權國為了達成想要的目的，允許其它行為者的尋租行為。這種國際政治尋租行為，是損害第三國的利益以獲得收益，其受害最深的是第三國。⁶³

門洪華雖然與田野一樣認為，冷戰後的國際新形勢下，所設立的國際制度是由霸權國所主導。但是由於國際政治讓位於世界政治、全球化進程加快、將促成多層次、多元化的國際關係體系架構。全球性問題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中心議題。以上種種情況，加深國際關係中的相互依賴。這種情勢下，國家間合作與國際建制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規範模式。⁶⁴

簡言之，儘管學者持有複雜相互依賴是不對稱的看法，前述代

62. 蘇長和，「安全困境、安全機制與國際安全的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第5期（1998年），頁38~41。

63. 田野，「尋租理論：國際關係的一種研究範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2期（2000年），頁17~22。

64. 門洪華，「國際機制理論的批判與前瞻」，*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2期（2000年），頁17~22。

表性研究者多認為，複雜相互依賴的國際情勢下，新自由主義提出的研究方法是比較能與現實狀況相符。換言之，即便中國學者強調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導致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卻不同於現實主義主張結構格局中的大國利用不對等關係所產生的權力，主導國際事務，進而反對國際政治因為相互依賴下的制度安排。

二、國際制度的相關論述

學者門洪華提出，美國是國際制度理論的發源地與重鎮，所以制度理論研究中，深深地鑲入了美國的政治與文化。再加上許多制度在形成初期，由於當時的美國是霸權國，所以美國同時也是制度的制定者。當今研究者須重視制度理論研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學界目前面臨美國霸權是否衰弱，與中國如何做一負責任大國等問題，但中國對於國際制度理論的瞭解，尚處在起步階段。他並主張，制度理論是理論論戰下的產物。當前的制度理論正面臨新的轉變期，中國學者須把握這個時機，想想如何綜合其它的理論，促進新的制度理論產生。⁶⁵

蘇長和也認為，國際制度理論是依據政治與經濟的自由主義設計。但這並不代表非民主國家對制度的承諾與遵守表現，會差於民主國家。簡單地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以為崛起中的中國為了獲得更多的相對權力，必然會破壞現有國際制度安排的觀點，十分牽強。蘇長和把中國與國際制度放在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的分析框架下，解釋中國接受越來越多的國際制度，對國內政治經濟和外交產生社會化的影響。換言之，中國參與國際制度過程中，國際規範的力量建構著中國的身份和地位、觀念和利益、預期與行動，是解釋中國對國際制度承諾信譽的可行途徑。⁶⁶

65. 門洪華，「國際機制理論的批判與前瞻」，頁17~22。

66. 蘇長和，「中國與國際制度：一項議程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0期（2002年），頁5~10。

綜上，蘇長和與門洪華的分析顯示以下幾點：首先，現今的制度大都是霸權國所制定；其次，中國研究者須加強制度研究，以有利於在理論重新論述時期，掌握新理論創新的能力；最後，不同於西方的論點認為：非民主國家因為缺乏民主國家國內結構和機制的限制，非民主國家較可能成為制度破壞者。中國學者提出，非民主國家加入多個不同制度，也會對國內產生社會化的影響，進而強化對國際制度的遵守。

三、民主和平／和諧和平

綜觀新自由主義理論發展過程，從康德「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道伊「區隔性和平」(separate peace)、威爾遜「十四點原則」、羅塞特以結構／機制限制模式 (structural/institution constraint model) 以及文化／規範理論模式 (the cultural/normative model) 提出「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 理論、雷克利用個體經濟學的觀點解釋民主的力量，到基歐漢與奈伊指出「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都強調民主國家為國際帶來和平的作用，展現出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內涵中對「民主和平論」的主要概念與關懷。

易言之，「民主和平」作為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核心之一，其所強調的是，民主自由所包含的核心價質對維護世界秩序的重要性，並藉由論證民主國家之間較不易發生戰爭，說明西方自由陣營建立起來的是「文明自由世界」。更甚有西方學者杭亭頓引用新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中的世界觀，認為西方與非西方國家陣營之間的文明差異，是導致衝突發生的原因。由新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衍生出來的「文明衝突論」，不僅強化西方的文明意識，將國際政治的分析單位從國家轉換為文明，同時在全球掀起推廣西方文明普世化運動。然而，對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者而言，這反而喚起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學者轉向，藉由追溯文明的根源，探

討中華文明是否能為「天下」和諧奠定新基礎。

例如資深學者時殷弘認為，不僅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和平倫理意義與西方康德式的道德理論不同，中國和平倫理與西方政治思想中代表和平的主要理論傳統，更有者極大的不同。這也是構成當今中西方之間「政治對立與歧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時殷弘指出，中國研究者須努力思考中國倫理文化中的戰爭與和平的理論性質。⁶⁷他進一步提出，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者主張民主帶來和平進而維護國際秩序，但也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探討和平的本質，以回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疑慮與批評，另外還可藉由中國視角的「和平觀」，建構屬於「中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核心。秦亞青即曾明確指出，雖然中國必然要建構屬於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但由於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缺乏拉卡圖斯所強調的「理論核心」，因此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未進入理論創新的時期。⁶⁸然而，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者除了開始嘗試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價值，區別其與西方「民主和平」的不同，並試圖將中國的「和平觀」帶入對新自由主義的反省。本文大膽認為，這將是一項理論改寫與創新的契機。

四、中國類型特徵的綜合

1997年之後，中國幫助東南亞國家渡過金融危機，消瀾「中國威脅論」，建立了「負責任大國」概念的雛型。同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從理性自利個體論出發，主張多重互動賽局下，國際行為者為獲得最大利益，將融入國際制度、遵循國際規範不以推翻現狀為主要目標，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大國崛起衝突不可避免

67. 時殷弘，「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倫理傳統：西方與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0期（1999年），頁62~63。

68. 綜合參閱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頁7~13；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頁13~23。

論，為中國「走向世界」鋪路，也因此逐漸被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重視。但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西方原始類型面前，中國研究者正面臨「相互依賴」之下隱含的「霸權穩定」暗示，以及與新自由主義共生的政治自由主義價值與中共一黨專政原則的衝突。⁶⁹正是由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原始類型包含不同面向的偏重，但使得中國研究者可以從中發展出有別於原型的論點。但這種「改寫」首先要通過以下理論性難題：

1. 由於現今的國際制度大都由霸權國所制定，因此中國代表性學者的國際制度研究主要面臨的問題是，從何種角度切入探討國際制度的起源與維繫；
2. 新自由主義原始類型的規範性框架中，中國代表學者面臨的一個兩難是堅守國家疆界、主權的國家主義，或是以全球主義闡釋性框架做為分析「複雜相互依賴」的出發點；
3. 新自由主義理論內涵中帶有理性自利的個人主義、基督教文明與民主和平說。這與中國傳統儒家學說、集體主義、非西方民主體制差異極大，顯示出中國的文化核心價值，與延續自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新自由主義有明顯的不同。中國理論界要如何在不同的核心價值上，推論出相同的「合作」結論？

為了回應前述難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軸，不再局限於西方的理論框架中，而開始追求國際關係理論的本土化。總結1998至2008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新自由主義主要研究者的成果，也顯示國際關係研究本土化的特徵。他們為研究添入自身的體驗，意味著中國學界對理論的論述過程中，拒絕與「身」的具體存在完全切割開來，去迎合「普世」的抽象思考。這很類似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考克斯（Robert W. Cox），以不同的文明、

69. 參閱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為與大國外交**（台北：元智文化，2003），頁236-237。

社會階級、性別、宗教、族群的認同形式 (forms of identity)，解釋「理論」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基礎。考克斯認為「理論」是在人們互為主觀的集體觀點中產生。因此，不因某種理論宣稱掌握洞察世界的認識論，擁有絕對的優勢地位。⁷⁰

然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社群，經由反思與論證之後，究竟仍是屬於新自由主義，或者形成其他思想派別？這涉及到彼等是否達到理論創新的條件。本研究認為，代表性研究者的成果與原始類型相比，還沒有達到推翻原始類型理論內核的程度。

陸、結論

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迄今已有顯著的發展，其中新自由主義研究者的貢獻非常顯著。⁷¹這個「知識社群」的研究內容，除了涉及如何建立一套理論的引介機制，以有利於理解來自西方的各種「主義」外，近年來也開始探討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理論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軸，不再局限於西方的理論框架中，開始追求理論的本土化。至於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發展是否產生理論移植或創新的現象，大概可以依據以下幾點做出結論：

第一，由於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客觀歷史進程」論，內含西方國家試圖將其價值普世化，因此困擾與折磨著中國的理論研究者。⁷²因此，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者以不同於西方的「客觀歷史進程」論，藉由強調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主張地域

70. 參閱Robert W. Cox, "Introduction," in Robert W. Cox ed.,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xi~xxiii.

71. 相關統計資料請參閱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頁13~23。

72. 參閱王逸舟，*環球視點*（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141~144。

性文化、思想概念不同，導致相異的歷史演變，強調「中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形成的必然性。⁷³換言之，中國新自由主義研究者所謂的「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並不是刻意區分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不同，而是「不認同」西方理論中隱含的道德價值。因此，中國研究者主張建立「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最顯著的差異是，強調中西方歷史發展路徑的不同，以及對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澱與現實經驗發展出相應理論，具有信心。⁷⁴

第二，雖然中國主要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內涵中的國際合作、複雜相互依賴、國際制度等論述的前提存有疑慮，但同時也認為合作獲利會大於衝突。歸結而言，儘管相較於西方新自由主義，中方學者較為偏重成本收益的概念，去解釋國際上合作的原因。這也恰巧符合新自由主義對國際行為者為理性、自利經濟人的假設。

第三，儘管中西方新自由主義研究同樣認為，國家間綿密互動網絡會牽引國家的國際／國內社會兩端距離拉近、稀釋「國家」在國際互動關係的重要性，並主張藉由知識社群的溝通、學習效果，最終能使不同體制國家為了獲得最大利益加入追隨既有的國際規範並進而促進這類國家內部的改革。然而，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民主和平論述，對中國新自由主義研究者看來，卻是存在重大的理論缺失與矛盾。主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研究者接受民主和平論的假設同時，卻推論出對異質文明的不信任，並認定其為威脅和平秩序穩定的文明衝突來源。⁷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者們群起反駁文明不是衝突。並強調中國文明與傳統政治思想展現出的雖然是不同於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民主和平」，卻是能為國際和平帶來貢

73.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頁13~23。

74.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頁13~23。另本文作者於2010年夏天前往北京、上海進行的深度訪談，也再度印證此一觀察。

75. 參閱張登及，「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的中共外交研究：一個概觀」，頁31。

獻的「和諧和平」。然而，相較於西方的「民主和平」，淵源於古代對世界秩序想像的「和諧和平」，是否能有所超越，還是僅能代表大中華圈區域性和平經驗，仍取決於中國國關知識社群是否能在觀念上與物質上，為「和諧和平」提供支撐。⁷⁶

總結而論，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新自由主義主要理論內涵中的國際合作、複雜相互依賴、國際制度之論述，與西方原型理論極為類似；另外，儘管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一再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與西方原型理論的不同，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國關知識社群的新自由主義研究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價值觀的相關研究，在質與量上都遠比其對新自由主義物質性理論內容研究為少。因此中國國關學界的新自由主義研究，尚未到達理論創新的階段。借用中共意識型態語彙講，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仍在理論創新的「初級階段」，要達到從知識論到政策分析的全面改寫，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儘管如此，這也不代表這個社群仍停在「理論移植」階段。其主要的的原因在於，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者除了對本國研究國際關係理論成果與缺失做過詳細論述，近年來也開始嘗試將中國的文化、歷史、哲學等跨領域學科與國際關係理論結合。種種趨勢可看出，中國學界的理論研析不再侷限於西方理論研究主要元素，也開始進行包含文化、哲學、歷史等跨領域研究，顯示了理論創新的強烈企圖心，值得台灣同行長期、密切觀察。

76. 參閱何新華，「『天下觀』：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區域經驗」，二十一世紀網路版。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9072g.htm>>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主編，**1998國際情勢年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2002）。
- 王逸舟分卷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王逸舟主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學，2006）。
- 王逸舟，「中國國際關係學的一種審視：對學科分支領域的快速掃描（中）」，**教學與研究**，第10期（2006年），頁31~38。
- ，「過渡中的中國國際關係學」，**世界經濟與政治**，第6期（2004年），頁7~12。
-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對成就與缺失的幾點感受」，**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3年），頁10~12。
- ，「面向新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若干思考與建議」，**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1999年），頁4~10。
- ，**環球視點**（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 田野，「交易費用解讀國家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維度」，**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02年），頁22~27。
- ，「尋租理論：國際關係的一種研究範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2期（2000年），頁17~22。
- 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何新華，「『天下觀』：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區域經驗」，二十一世紀網路版。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9072g.htm>>
- 奈伊（Joseph S. Nye）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門洪華，「國際機制理論的批判與前瞻」，**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2期（2000

年)，頁17~22。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1期（2008年），頁13~23。

-----，「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6年），頁7~13。

時殷弘，「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倫理傳統：西方與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0期（1999年），頁62~63。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為與大國外交**（台北：元智文化，2003）。

-----，「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的中共外交研究：一個概觀」，**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11期（2001年11月），頁15~34。

蘇長和，「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啓示」，**世界經濟與政治**，第7期（2004年），頁1~10。

-----，「即將到來的大國衝突？《大國政治的悲劇》及其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3年），頁73~76。

-----，「中國與國際制度：一項議程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0期（2002年），頁5~10。

-----，「安全困境、安全機制與國際安全的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第5期（1998年），頁38~41。

蘇長和、彭召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貧困：對進20年國際關係學在中國發展的反思」，**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1999年），頁15~19。

二、英文

Adler, Emmanuel and Peter M. Haas, "Conclus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Order,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flective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Winter 1992), pp. 367~390.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ian Press Ltd., 1995).

Carlsnaes, Walter,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 Cox, Robert W. ed.,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unne, Tim,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Genest, Marc 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tario: Thomson Learning, 2004).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 Gourevitch, Peter,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1.
- Hayek, Friedrich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Ikenberry, G. John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Summer 1990), pp. 283~315.
- Kegley, Charles W.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Glenview: Harper Collins Pres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89).
-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 Keohane, Robert O.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katos, Imre,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Lakatos, Imre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ke, David A.,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ch 1992), pp. 24~37.

Milner, Helen V.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Nye, Joseph S.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uary 1998), pp. 235~251.

-----,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Powell, Robert,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Issue 4(December 1991), pp. 1303~1320.

Rittberger, Volk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Ruggie, John Gerar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Summer 1975), pp. 557~583.

Russett, Bruce M.,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mith, Steve,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in, Arthur A.,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Stein, Arthur,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Spring 1982), pp. 294~324.

Tickner, Arlene B.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9).

Vasquez, John A.,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00.

聯絡作者：余佳芳、張登及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344巷10號3樓

E-mail：nanaloveu99@gmail.com、tchang@ntu.edu.tw

收稿日期：2010/8/30

審查通過：2010/12/22

責任編輯：李奇峰

